
风 土

●〔日〕和辻哲郎 著



商务印书馆

日本学术文库

风 土

〔日〕和辻哲郎 著

陈力卫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6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土/(日)和辻哲郎著;陈力卫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日本学术文库)

ISBN 7-100-04830-3

I. 风... II. ①和... ②陈... III. 气候影响—民族文化—研究—世界 IV. G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935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日本学术文库

风 土

〔日〕和辻哲郎 著

陈力卫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民 族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4830-3/C·137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7 3/8

印数 5 000 册

定价: 13.00 元

“日本学术文库”第一辑目录

风土	和辻哲郎
日本人的心理结构	土居健郎
日本官僚制研究(新版)	辻清明
日本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	丸山真男
日本的近代与翻译	丸山真男 加藤周一
知识分子的责任	加藤周一
法窗夜话	穗积陈重
东洋的理想	冈仓天心
中世世界的形成	石母田正
日本的佛教与神祇信仰	义江彰夫
日本的神道	津田左右吉
国民性十讲	芳贺矢一
大和玉篋杂稿	本居宣长
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	内藤湖南
日本政治	京极纯一

译者简介

陈力卫 1982年黑龙江大学日语系毕业。1984年北京大学东语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90年于东京大学日本语言文学专业读完博士课程。现任日本目白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

责任编辑/王仲涛 封面设计/李有良

FUDO

By Watsuji Tetsuro

©1935, 1960 by Masako Watsuj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ese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1935.

Thi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year of publication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Bei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本书根据岩波书店 1979 年版译出

国内编委会

主编 王仲涛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晓秋 卞崇道 叶渭渠 刘德有 汤重南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刘克申 何培忠 张明国 周维宏 谢岳 翟新

国外编委会

主编 刘迪

顾问

加藤周一 大西健夫 小口彦太

编委

陈力卫 林少阳 吴卫峰 崔保国

编者序言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早在古代，日本尚未进入世界大多数国家人们的眼界，中国史书《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籍就予以记载，不特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而且也是研究日本古代史唯一的文字资料。其时，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国文明光耀世界，领袖东亚。古代日本举国一致，倾力学习中国，引进中国的文字、宗教及典章制度等，曾几何时，便为一文明国家，故谓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流并非过言。中世纪时日本仍旧关注中国，继续吸取中国文明，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中国却很少学习、研究日本，及至江户幕府，日本行闭关锁国之策，中国和日本的交流几至中断。

千余年来，两国的交流与相互研究的这种不均衡，固然与中国为东亚文明中心，而日本处于边缘的位置有关，但也和两国朝代更迭，对外政策变化频繁不无关系，此可为前车之鉴。

19世纪以降，西力东渐，近代思想文化、科学技术传到亚洲，日本得风气之先，仿效西方，断行明治维新，一举成为东亚最初的近代化国家。同时吸收西方近代文明，参以本土文化，成就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近代日本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日本败亡，日本的思想、学术摆脱了法西斯文化专制的桎梏，焕然一新，百花齐

放,硕果累累,并涌现了不少世界一流的学者或思想家,为世界所瞩目。

反观清末以来的中国,列强肆虐,国将不国,仁人志士痛定思痛,欲效仿日本,实现近代化,救国于危亡之中,故大批中国学子赴日留学,攻读近代法政、科学等课目,归国后给中国带来了改革图变的新风。虽然他们学习的是西方近代科学,但也将日人的社会科学、文学作品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而对日本的研究则出现了黄遵宪这样的大家。但当时中国形势动荡,加之战祸频仍,故日本学术著作的翻译既未能形成规模,也没有构成体系。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与各国的文化交流方兴未艾,尤其是学术著作的翻译空前昌盛,蔚然大观。但与译介欧美著作相比,对东方各国,包括日本的学术著作的译介相对薄弱,这是中国对日本整体情况缺乏系统了解,其研究远不及欧美的原因之一。中国是最先知道日本的国家,而今却落人之后,不能不使有识之士为之扼腕。

商务印书馆自开馆以来,以开启民智为己任,百年来倾力移译各国学术著作,积累丰厚。其中,所译日本各类书籍不下百余种。但囿于时代与环境条件等,许多名著未能译出,尤其是日本古代的思想学术著作少之又少。

有鉴于此,商务印书馆和日本早稻田大学合作,欲翻译出版日本古往今来之社会科学经典名著 150 种,尽其所能将日本学术精萃尽收网罗,差可弥补往日翻译之不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次大量翻译、引进日本学术名著不仅可借鉴其理论及方法论,开拓我国学人之识见,且可较为深刻、

系统地了解日本历史、国家、社会、民族及目前的学术状况,俾使中日两国人民加深互相理解。

本丛书所选原书皆为经典名著,且译者也为各相应领域中的专家,每种书前均有专家导读,注释亦求详备,一般读者当会因此获益。

本丛书虽规划为 150 种,但随着学术进步及今人眼光改变,难免再做补充。我们志在使这套丛书尽善尽美,少留或不留遗憾,为此呕心沥血,在所不辞。然自谓才疏学浅,汲深绠短,不免疏漏错讹,如蒙方家指正,则不胜荣幸。

王仲涛

刘 迪

2005 年 12 月

导 读

(一)

我生在西安，从小就听人说“陕西十八怪”，什么“房子半边盖，面条像裤带，吃饭蹲在门边外”等等。自己生活于其中，并没觉得特别“怪”。年长后，走的地方多了，才知道似乎每处都有那么几“怪”。想想中国地大物博，各地风俗迥异，本不足为奇。但陕西的房子半边盖一直是我心中的景象，每到一处都注意房子的结构，后来看到那套“中国民居”的邮票，才知道还有那么多形形色色的建筑式样。这种因地制宜的建筑（还有服装、风俗习惯等）当然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是我们的祖先与自然相处中总结出的一套经验。如果说它的形成过程是历史，而形成结果是文化的话，那么，历史、文化的基础就是风土。

风土，当然包括天气、地气等自然环境，但在本书里不是讨论环境怎样决定人的存在这一问题，而是认为人类总或多或少地背负着“过去”，这种过去又是特殊的“风土的过去”。即历史既是风土的历史，风土也是历史的风土。风土不光是指外界自然，而且包括独自的生活习惯和建筑式样等。这也就是说，既有“自然的风

土”，又有“人文的风土”。

本书讨论的正是这种“人文的风土”，即历史、文化以及民族的相互关联的问题。

（二）

文化不同于文明，它是一个民族自古以来所经营出的一定的生活方式或传统观念。无论历史怎样变迁，生活怎样变化，它都照旧存在。这种文化的创造与外界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越往古代上溯，人类受外界自然的支配程度就越大。这样，考察文化中最基础的部分便往往需要追溯到该民族的历史之始。而人类历史在初期愈发受自然左右的话，其民族文化的早期特征也必然要受其所居住的土地的制约。风土——由于是人类为抵御外界自然而形成的生活习惯及民族精神的烙印，因此也必然成为人类自我了解的一个契机。作者和辻哲郎把这种风土分作三种类型：季风、沙漠和牧场，欲藉此探求人类存在的不同形态。

第一种季风地带，包括中国和日本，但最能反映其特色的是“南洋”（东南亚）。那里夏季的西南季风同时带来热带的酷暑和潮湿，使之带有两面性：一方面要求人们不得不忍耐这种自然的淫威；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享受到自然所赋予的丰富惠泽。这样便形成了人们丰富而细腻的感受性和忍辱负重的双重性格。第二种沙漠地带指阿拉伯、非洲、蒙古等地，严格地说是缺少雨水的广漠不毛之地（desert）。那里气候干燥，缺少生机，一片荒凉。所以要求人们必须团结一致、绝对服从命令，并不断地与其他部族相争，

才能获得本来就匮乏的自然资源。于是,这里的人们养成了服从、好战,且又讲实际、意志坚强的性格。第三种牧场地带指的是欧洲。南欧明朗,北欧阴郁,但都是夏季干燥冬季湿润。这种气候阻止了野草的肆意繁衍,使自然变得温顺而有条理。所以,人们既不必像季风地带的人那样忍耐、屈服于自然,也无需像沙漠地带人那样畏惧自然。在这种风调雨顺的自然环境下,才会使人得到解放,产生出合理主义精神,才会萌发出自由的观念以及哲学和科学的思想。

作者通过对上述三种风土类型的考察,进而分析了各个地区的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特征,为我们展示了其理论的深度和广度,并提出:“世界史必须给不同风土的各国人民留出他们各自的位置。”

(三)

中国属于季风地带,但它不同于南洋那种单一的气候下所导致的文化上的匮乏,也不像印度人那样容易感情充溢,却又缺乏历史的眼光。中国人注重血缘关系,对历史特别地执著和固守。著者在昭和初年(1926年)目睹的中国正是在无政府状态下、不依靠国家机构而自活的、不轻易流露情感的中国人形象。他认为这是由于“茫漠的大陆”上那难以忍受的“空漠的单调”所导致的。

对于这种看法,我们固然可以找出不少材料加以反驳,比如我们中国人眼里那气势磅礴的大自然风光,在著者看来却是一幅单调的、无变化的、空洞的构图。他举长江为例,说其宽广甚至比日

本的“海”的概念都大，以致于人们无法体会并把握之，只感到是同一局部的无息不止的重复而已。著者的言下之意显然是要说日本的山河小巧玲珑、富于变化，并欲以此为尺度来衡量中国以显现出两者的差异。

著者笔下的这种中国印象，反映了其所处的时代的制约以及所观察的范围的局限。当时的中国正值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蚕食下的半殖民地状况，著者仅仅通过对某一局部的短短一瞥，便从民族特性扩展到文化艺术上，其中的直观飞跃不免显得过于唐突。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著者也正是凭其新鲜的体验和敏锐的直觉发现了中国人“不甘服从、不愿受约束、不依靠政府”的精神特性，并对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孙中山追求革命锲而不舍的举止予以极大的赞赏。加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敬佩，不也都是一种直观的反映吗？

有关中国这一部分，最初是以“中国人的特性”为题发表在昭和四年的《思想》杂志上的，本书成于昭和十年（1935年），昭和十九年五月著者对此部分作了大幅度修改，如本书前言里所交待的那样，“初稿完成时正值左倾思想盛行之际，故多有批驳其思想理论之成分，此次修订时这部分予以删除，改写成纯粹的风土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著者对此部分又作了若干修改，加上了著者在香港的一些见闻，但基本观点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这两易其稿一方面说明其中国部分的把握含有不少因时而变的因素，另一方面也说明一点，要想全面把握中国人的特色的确是相当困难的。

在《风土》出版后不久，同时代的哲学家安倍能成便一针见血

地指出其学术步骤上的缺陷：“立论的材料取决于主观，欲使其判断臻于准确，亦难免带有主观的局限性。”我想这一批评用在其描写中国的部分上尤为贴切些。

(四)

从东西方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看，此书无疑是一部研究日本文化的杰出之作。无论是观察分析哪一种风土类型，著者脑海里始终未离开日本这一比较的坐标。对于同属季风地带的日本，他举出夏有暴雨和冬有大雪这两大特征来区别于其他地方，再加上台风所具的那种“季节性、突发性”更给日本人身上打下了双重烙印，即在沉静的过程当中时刻蕴含着某种突变的可能性，因而感情总是处于激活状态，反应敏锐。其结果是易导致精神疲劳，难以持之以恒。相比之下，中国大陆所具有的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甚至可以作为日本人精神修炼的目标。也就是说，除了季风地带所共有的感受性强、忍辱负重的特性外，尚有日本人独特的双重性格：沉静而富于激情、好战而趋于恬淡。在沉静中会迸发出激情；在勇于战斗中会突然达到一种谛观的境界。犹如樱花一般开得突然而热烈，落得悄然而彻底。

著者认为产生这种国民性的基础就是具有空间的、相承关系的“家”这一基本单位。如同沙漠人的关系体现为“部族”、牧场人的关系表现为“城堡”这一基本单位一样，日本人古往今来都有一个区别于“外部”的“内部世界”。基于这一内部世界的情爱，可享受亲密无隙的结合之同时，又可以为了“家的名誉”轻而易举地去

献身舍己。这也正是日本人情死和自杀多发的原因之一。

当然,这种对“家”的制度的描述会导致一种对以“家”为中心的国家观的肯定态度,就是全体日本国民共为一个大家庭,当然要听从家长(即天皇)的指示和教诲。而这样必然会有利于集权主义的抬头。因此,此书一经出版,就被批判为拥护天皇制的意识形态上的一个理论基础。从全书流溢着的那种赞美神国日本的爱国情结上,我们也不难看出著者的这一立场,而这是需要加以批判的。

(五)

著者和辻哲郎,1889年出生于兵库县神崎郡的一个医生家庭,1906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后编入东京大学),191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的伦理学专业,翌年便由岩波书店将其毕业论文《尼采研究》出版为处女作。随后在法政大学、庆应大学一边执教一边凭其敏锐的直觉和对学术的满腔热忱,接连写出了《古寺巡礼》、《日本古代文化》等著作。他中学毕业前一直想作一名诗人,进入高中后才开始逐步倾倒入哲学。1925年经第一高等学校的恩师原胜郎和京都大学西田几多郎的推荐,去京都大学任副教授。1934年调回东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1949年退休。1955年获文化勋章,1960年因心肌梗塞在东京去世。其著作颇丰,代表作除本书外,尚有《原始佛教的实践哲学》、《伦理学》、《锁国》、《自传的尝试》等。

1927年2月他奉命赴德国留学,为时一年有半,这期间受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影响,开始考虑空间与时间的关系,由此促

成了《风土》的构思，在“致故乡的妻子”的信中初成雏形。回到京都大学后写成讲义稿，原题为《国民性的研究》，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想通过空间上的“人文的风土”来研究人之存在的不同特征。结合中国部分的原题《中国人的特性》来看，这点更为明显了。

《风土》在 1935 年出版后，反响巨大，成为知识分子的必读之作。其后，为了追求体系上的更加完整，他在《伦理学》一书中又加上了对俄罗斯文化和美国文化的风土性考察。但因著者没有亲访过这两地，较之前三种类型的观察和分析不免略显逊色。

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和辻哲郎也难免对欧洲有一种特别的偏爱，但他没有忘记从东方看西方的重要性，同时也对西方的尺度做过一定的批判。但更令人赞叹的是他对文化的感受之敏锐、所涉题材之广泛。正如前人所评论的那样，“他那敏锐的触角直捣问题的核心，然后又展开其脉络，执著而愉快地探求之。”正是凭着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他排除了一切有可能阻碍学术研究的因素，朝着自己的目标锲而不舍，奋勇直前。

（六）

此书早在五十多年前就被译成英文，随后亦有德文版的出版。可见其影响经久不衰。而此次中文版的翻译我希望不仅可为上一世纪 20 年代的日本人如何看世界、如何看中国提供直接的材料，而且亦希望读者把此书当成认识我们自己、认识世界的一面镜子。

就我自己来说，翻译此书真相当于一次旅行。我一手捧着世